

2020年援非援疆援藏援鄂医师代表座谈会暨以岭关爱医师健康专项基金签约仪式在京举行

中国医师：有援必去 有疫必上

医师报讯（融媒体记者 熊文爽）回想起武汉早期抗击新冠疫情的“至暗时刻”，被誉为援鄂“重症八仙”之一、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重症医学科姜利教授依然心有余悸。“在医疗设备和防护不足、专业人员严重短缺的情况下，我们能做的就是尽可能地创造条件，力争把我们最好的治疗水平发挥出来。”

8月13日，作为中国医师协会文化工程的重点项目的主要表现形式之一，中国医师协会以岭关爱医师健康专项基金系列活动—援非援疆援藏援鄂医师代表座谈会如期召开。与以往不同的是，为大力弘扬抗疫精神、学习抗疫先进事迹，本次座谈会特别邀请了援鄂医师代表参加座谈。

会上，中国医师协会和以岭药业签署了中国医师协会以岭关爱医师健康专项基金的第三个3年合作协议，继续携手建设医师健康工程，关爱医师健康再启航！

“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这个没有硝烟的战场上，每一位医务人员都是英雄。”北京医师协会副会长许朔提到，多年来，协会一直呼吁医生关注自身健康。“医师的身心健康也是我们社会大众的心愿。如果医生病倒了，不知道会影响到多少患者的健康。没有全民健康，就没有全面小康，而医师的健康，是全民健康的基石和保障。”

“不管是援非、援疆、援藏还是援鄂，其艰难困苦程度非常人所想，即使日常工作中，医生也面临着多重压力。因此，我们希望能够尽己所能，为医师朋友解决后顾之忧。”以岭药业关爱医师健康基金执行总干事武双平表示，在中国医师协会的指导下，以岭关爱医师健康基金的目的和初衷，就是持续关注中国广大医师群体的身心健康问题，希望通过多种形式的关爱活动和项目，为广大医师提供健康、交流的机会和平台。“我们的目的只有一个——让大家更专心地服务于广大老百姓，真正实现健康医师、健康社会、健康中国的使命。”

“在本次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战斗中，我国医务人员不畏牺牲、积极抗疫，为打赢疫情防控战作出了突出贡献，向所有医务工作者致敬！”中国医师协会副会长杨民在讲话中指出，中国400万医师责任重大，面临着社会、临床、科研和家庭等多方面的压力和挑战。重压之下，医护身心健康状况不容乐观。六年来，中国医师协会以岭关爱医师健康专项基金始终坚持为一线医务工作者开展以“送知识、送感情、送关怀”为主题的关爱活动，增进医师身心健康。“这是中国医师协会作为医师之家对医师家人的关爱。而对于医师的关怀和成长，党和国家也给予了更高的关注。日前，钟南山院士获评共和国勋章，张伯礼院士、陈定宇教授、陈薇院士获评人民英雄国家荣誉称号。这是医疗界首次获此国家最高殊荣，充分体现了党和国家对医务人员的高度重视、关心和肯定。”



援藏：是责任更是荣誉

尽管对高原缺氧的环境和长时间与家人分离的生活有所顾虑，但当我们踏上飞往拉萨航班的那一刻，心中想着的就只有如何尽快适应当地环境，如何完成好援藏任务，不辜负各方面的期望。

拉萨海拔高，嘴唇发紫、呼吸困难是每日常态，但随着援藏工作的不断开展，大家似乎都忘记了高反，并将其视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在旁人眼中，一年的援藏工作似乎有些漫长，但每到援藏队员的交接期，大家总会觉得这一年时间不够用，担心工作没做完，舍不得当地的同事和学生。

这么多年来，北京协和医院的援藏目标是“要把西藏自治区人民医院当成协和的‘大西院’来建设”，变“输血”为“造血”，每一位援藏队员都抱着“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的信念，脚踏实地、接续发力，紧密结合当地情况，为西藏医疗事业的可持续发展 and 西藏人民的健康福祉不懈努力。

中组部医疗人才“组团式”援藏第三批队员、北京协和医院麻醉科 申乐

援鄂：不可复制的财富

自1月下旬支援武汉以来，3个月的时间里，我和同事们见证了新中国成立以来防控难度最大的一次疫情。

早期的武汉，医疗设备和防护不足、专业人员严重短缺，工作条件异常艰苦。在当时的情况下，每个人都是身兼数职，尽可能地创造条件，力争把我们最好的治疗水平发挥出来。

面对新冠肺炎这一新型疾病，我们在治疗过程中需要不断地讨论、摸索。早期的治疗压力很大。但值得欣慰的是，在4.2万援鄂医务人员的努力下，疫情慢慢得到控制，趋于缓解。在我的印象里，2月下旬，武汉的气氛就没有那么紧张了，3月份觉得疫情是可控的了。如今回首，一步步走来实属不易。对我而言，这段援鄂经历是不可复制的宝贵财富。

援鄂“重症八仙”之一、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重症医学科 姜利

我是一名“90后”，当我真正进入感染区时，心里非常紧张。我们是什么时候真正放下心了呢？是看到院长、呼吸科主任等领导带头冲锋陷阵，看着他们义无反顾的背影，我们这些年轻医生的心瞬间就踏实了，这就是医生的传承，前辈们传给我们的不仅是知识和医术，还有精神。

在本次抗疫中，我接触到了纯粹的医学，救治过程中不会涉及到利益，没有医患纠纷，大家齐心协力解决疾病，利用各种条件解决困难，把性命所托、健康所系的医学誓言发挥到了极致，让我的内心非常受鼓舞。

第三批国家援鄂医疗队、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心血管内科住院医师 翁浩宇

援非赤子的家国情怀

我的援助经历比较多：2003年，抗击非典；2008-2010年，援助西非几内亚；2015-2016年，援助北美特立尼达和多巴哥；2017年，援藏。

有这么一群人，他们是天使的化身。从上世纪50年代至今，他们经常受命出征，迎难而上，甚至冒着生命危险，不辱使命地开展医疗援助。从祖国边疆医疗条件相对落后地区，到各种灾害疫情出现省市；从几内亚、赞比亚、埃塞俄比亚等非洲大陆，到北美洲特立尼达和多巴哥等海外医疗资源严重匮乏国家，都留下了他们的足迹和故事。他们把医术留在当地，将希望带给百姓，用赤子之心推动医疗发展。他们，就是援非援疆援藏援鄂医师。

援非期间，我和队员们种过菜、修过电、喝过脏水、吃过霉米和烂菜、还遇到过军人政变和反对派之间的武装冲突。我们经常穿着长筒雨靴、打着手电做手术，在蜡烛、马灯下做饭、学习，援助的2年时间里都生活在动乱之中，其艰难险阻非常人所想。庆幸的是，最终有惊无险，我们都坚持了下来，圆满地完成了援助任务。

有记者问我，援非回来后，自己的医疗水平会不会下降？我认为不会——从学术上而言，2年内出现突破性升级的可能性不大，而且学术进展也不是完全隔绝不知，关键在于有心；从个人能力而言，非洲的患者非常多，病情大多严重，因此，也给了我们全方位的见识和锻炼。非洲人民非常认可中国大夫，不分专业都喜欢找中国医生。我是耳鼻喉头颈外科医师，但在援非期间，除了开颅、开胸腔手术以外，其他专业的手术我都做过，2年援非看诊了2万多名患者，大小手术、操作近千例，是一个非常好的锻炼机会。

出国后我才明白祖国在自己心中的非凡地位，我们做的不仅仅是医疗援助，还彰显了我国的大国风范、国际主义精神，特别自豪。

中国援非医疗队队员、北京世纪坛医院耳鼻咽喉头颈外科 彭洪

因为各种机缘巧合，我曾先后三次援几内亚。于我而言，援非已经成为一种情怀。

1994-1996年，几内亚的3个医疗点我都去过，其中，法拉纳的环境令我印象深刻，是没有亲眼目睹的人根本想象不到的艰苦和落后。缺水、缺电、多传染病……甚至因为战乱，我们必须做好随时撤离的准备，每一天都紧绷着神经。

2001-2002年，当时北京同仁医院组队，临时有一个大夫生病，需要有经验的、不用培训法语的医生补充，领导临时召唤我去，我就义无反顾地又去了一次。

2010-2012年，我心中难舍对几内亚人民的情谊，于是主动参加援非。针灸疗法经济易行，效果立竿见影，深受当地人民欢迎。期间，我曾在首都科纳克里，每周2、3次为总统做针灸保健。

高兴的是，当我第三次援非归来后，被光荣地评为全国援外医疗队的先进工作者。

近年来，我国发展迅速，援非医疗队的驻地环境得到了很好的改善，令人既骄傲又欣慰。三援几内亚，虽然过程艰苦，但一切都值得。

中国援非医疗队队员、北京天坛医院针灸科 曲梅

援疆：他们真的需要帮助

相对援非而言，援疆援藏没有那么苦。援藏主要是自然环境恶劣，援疆则是政治环境复杂。

援疆之前，考虑到当地环境因素，以及要两地分居，我媳妇对我说：“你要去的话，咱们就离婚。”但最后我还是去了，当然，婚也没离。

去了新疆之后，发现当地较为贫穷。村民来看病时，若是需要住院，他们就会背着一袋没有馅儿的馒头，蘸着茶水当一日三餐。如果要做七八千的手术，他们就要先回去把房子卖了，筹了钱再回来。最糟糕的是，当地部分医生没有医师资格证，医疗环境不容乐观。

援疆归来，我的感触特别深刻，他们真的需要帮助。

——中国援疆医疗队队员、北京地坛医院骨科 李曙光